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孔子的思想是否具有体系、其思想的核心是“仁”还是“礼”等问题上各执己见，争论不已。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记载孔子思想的文本极易使人得出种种不同的诠释。为尽可能逼近和把握孔子思想的本义，笔者拟依据《论语》等经典，从其言行入手，进至文本所说的情景之中，并从其为学和思想演变的进程着眼，抓住若干系统阐述其思想及其发展历程的关键语段，通过对其文本意义的剖析，来探讨孔子思想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全过程，揭示其晚年的思想真谛及其理论体系。

一、孔子为学的历程

孔子晚年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在这里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追述了半个多世纪中其学问道德不断增进、精纯的历程。以下按时间顺序分析上述过程。

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一生虽好学，但不同时期所学的内容则各不相同。其早年所学应以礼为主。鲁乃周公封国，有天子礼乐。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从小即对礼感兴趣。《左传》云孔子27岁时曾向郯子学习颛顼以前的官制，又载孟僖子去世前所言：“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孔子35岁时，僖子卒。《论语》则云，孔子始仕，“入太庙，每事问”，以致人有“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的议论。（《论语·八佾》）。这说明35岁以前孔子已以知礼、好礼闻名于世，其15至30岁所学当以礼为主，礼在其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所言“三十而立”是说其30岁时学礼有成，社会地位已初步确立。30岁时孔子有君子“不盖不义，不犯非礼”（《左传·昭公二十年》）之语。34岁时孟僖子曾令其子向孔子学礼，36岁时齐景公向孔子问礼，这都表明当时孔子之学的基础在于礼。以上事实表明“三十而立”系指孔子通过学礼而知礼，30岁时学问、道德业已有成，并获得了社会的承认。

“四十而不惑”指孔子40岁时学问、道德业已无所困惑和迷乱。从其经历来看，孔子35岁时，季氏当政，孔子因而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并指责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此时他已认识到仁比礼乐更重要。不久，鲁国内乱，孔子赴齐，为高氏家臣。“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后孔子返鲁，因季氏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国无君且无道而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说：“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史记·滑稽列传》）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识到三者乃起志、立身与成性的关系。简言之，也就是学诗、学乐足以使人学问淹贯、道德高尚。按上可知，孔子是在鲁国内乱的变局中，通过继续研习礼，尤其是通过学诗、学乐以明了和把握仁的途径，其学问、道德才趋于成熟和融会贯通，并走向不惑的。

“五十而知天命”是说孔子50岁时已认识到天赋之命。从其经历来看，孔子在40到50岁之间因鲁国无道，退而不仕。但到50岁时，鲁国政局并未有任何改善，孔子却一改以往不仕的态度，始则欲应以费叛季氏的公山不狃之召，继则接受鲁定公之命出任中都宰，历任司空、大司寇和行摄相事。其中原因与其学问、道德的进升，思想的变化和境界的提高密切相关。而学易应是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又说：“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周易·系辞上》）。认为易道行乎知、礼之中，穷理入神则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则礼卑如地而济物成务，变化行则万物天赋之性成且存存不已，而出乎道义。孔子50岁前由不仕而仕态度转变的原因，即在于学易令其明晓知崇而效天之理，使其从仅知人事而“不惑”的知者，进升为穷理尽性上达变化不测之天的知天命者，并使其认识到万物之成存由乎道义，自己在天性和道义上有责任追随圣人，崇德广业，从而决意出仕以弘大天道。正因为如此，孔子50岁以后即以知天命自许。

“六十而耳顺”是指孔子在知天命后日益“通晓”天意，这从60岁以后孔子的言行可以得知。孔子60岁时，听说鲁国大火，即知桓、亲尽而庙不毁，宜为天所灾，而曰“灾必于桓、庙乎？”“已而果然”。（《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所说“六十而耳顺”应与此预言得以证实有关。孔子68岁时，季孙欲按田征赋，使冉有征求孔子意见。孔子因其不仁非礼，对冉有的再三发问置若罔闻，只推说“不识”，并说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所以即使在63岁绝粮于陈、蔡之际，孔子仍教导学生当顺从天命，修其道而推行之，而不必求容。（《史记·孔子世家》）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系指孔子70岁时已从耳顺进至心与所欲亦与天意合的境地。孔子71岁时，因西狩获麟而感叹道：“孰为来哉！孰为来哉！”伤其与己一样生不逢时，并因自知“吾道穷矣”，而“反袂拭面，涕沾袍”。（同上）齐陈桓弑其君，孔子斋而后见鲁君，请求伐齐。并告人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孔子死前曾对子贡说：“汝来何晚也？”又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并叹而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史记·孔子世家》）按上述孔子的言行举止及其流露的感情可知，70岁以后孔子的修养已达很高境界。

综上所述，只有从孔子自己总结的进学、进德次第出发，方能真正了解其思想发展的进程，把握其思想的真谛。以下拟就若干基本概念分析其思想的演变。

二、由“礼”到“仁”的重点转移

孔子的学问、道德在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同时，其思想必然也会经历一成长、发展并日趋精纯的演变进程，他对礼、仁、道、德的认识和关切程度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了从礼向仁和道、德重点的转移。

按前所述，孔子35岁以前以知礼闻名，35岁时已认识到仁的重要，此后逐渐从重礼转向重仁，并发展丰富了仁的思想。孔子对管仲评价的变化即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孔子曾说：“管仲之器小哉！”当有人问“管仲知礼乎”，孔子答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将管仲视为不知礼者，贬鄙之意溢于言表。但当子路和子贡分别因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相之，而问：“管仲非仁者与？”孔子却因“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而强调“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又将管仲视为仁者而大加褒许。孔子对管仲评价前后的不同，使后人发出了“圣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程树德，第987页）的疑问。造成这种评价不一的原因即在于孔子思想的变化。也就是前者系重礼时期的产物，其时孔子将礼作为人物评价标准；而后者则产生于重仁时期，当时孔子已将仁视为比礼更重要的评价标准。

在重仁的同时，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亦经历了一个发展、丰富的过程。仁是孔子中年以后十分重视、也是学生不断问及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孔子与其不同辈分弟子间的问答，即可剖析仁的内涵之演变。就早期而言，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孔子言：“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据上可知，孔子教颜渊、仲弓之语系来自前人，而非其首创。当时孔子将礼视为仁之目，以礼规范仁，认为仁即以礼克己，勿将己所不欲者加于他人。这时孔子对仁的理解应与其思想的重点从礼转向仁不久、仍相当重视礼有关。就中期而言，原宪曾问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而当子贡直接问仁时，孔子则明确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按上可知，孔子其时已不以克己和怨欲不行为仁，而以民受其赐、立人、达人为仁。其说与上引孔子对仁的诠释截然不同。其原因即在于原宪、子贡问仁是在颜渊诸人之后，此时孔子所说的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就晚期而言，樊迟曾三次向孔子问仁，子一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即早期的克己复礼为仁；二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亦即中期仁之含义；三则答以“爱人”（《论语·颜渊》）。又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合而为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据上所述，孔子晚年所说的仁在继承、涵盖以前克己、复礼、推己及人和恭、敬、忠诸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爱人和惠、宽、信、敏诸义，使之更趋丰富和完整。

最后，仁的意义的丰富和提升使孔子晚年返鲁后所言之仁，成为一种很高的道德评价标准。孟武伯曾向孔子问子路、冉求和公西赤“仁乎？”子曰：“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其学生的评价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他曾对小其42岁的晚年弟子公西华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尔已矣”。公西华则叹道：“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晚年不仅认为众多学生不得称仁，连自己也不敢以仁者自居。

三、由“仁”至“道”、“德”的重点转移

先就从“仁”向“道”的转移而言。60岁以后，孔子逐渐转而强调道、德，并将其置于仁之上。有证据表明，孔子曾将仁与道等同看待。如在陈绝粮时，孔子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史记·孔子世家》）。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对曾参亦曰：“吾道一以贯之”。按曾参的理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同上）可知孔子曾将忠恕或仁视为其一以贯之的道。但在另一场合，孔子又有“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礼记·中庸》）之语，认为仁或忠恕去道不远，而并不等于道。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即在于孔子晚年已将仁视为低于道的一个构成要素了。

孔子晚年所强调的道大致可分为君子之道、圣人之道和天之道。子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此系“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孔子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并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足见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包括知、仁、惠、义、勇、恭、敬诸义。

在君子之道之上尚有圣人之道和天之道。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又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者“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两者的差别在于施、济范围的广狭和数量的多寡。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虽很少述及性与天道，但并非没有论述。按《礼记·哀公问》、《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和《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所载，孔子亦曾论及“天道”、“天之道”和“天之至道”，孔子曾言天道当毋庸置疑。天道在孔子思想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圣人、君子之性与道均受之于天，系天之所命或天之所赋，君子之道、圣人之道和天之道三者既相通又有别。

又就道与仁的地位而论。在《论语》中，道与仁均具有高于生死的重要价值。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主张“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由于以上言论未同

时述及道与仁，又无具体的时间背景，两者的关系遂难以确定。但按以上数段文字所言，可知在孔子晚年的思想体系中，仁仅构成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仁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显然低于道。孔子晚年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从立志与依从、理想与手段的关系来说，道亦高于仁。由上可知，孔子晚年不仅重道，而且将其置于仁之上。

再就从“仁”向“德”的转移而言。德也是孔子晚年十分重视的一个概念。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礼记·主言》）。此系对其晚年弟子曾参所说。孔子在这里将德与道相提并论，认为两者是道以明德、德以尊道的关系。孔子对鲁哀公所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即将德视为道之所行。孔子晚年喜《易》，所作《系辞传》下曰：“精义入微，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其言将崇德视为对常人的最高要求。孔子晚年曾与小其48岁的子张和返鲁后所收的弟子樊迟两次谈及“崇德”（《论语·颜渊》），这都说明孔子晚年的确很注重德。

孔子所说的德包括多层含义，一曰道德、修养和品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子罕》）之德，即属此类；二曰恩惠，如“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之德；三曰天所赋予的属性，如“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在孔子眼中，德是上天所赋予人的天性，在己表现为德行，推己及人则为恩惠。

德的外延相当宽泛，按上所述，德包括知、仁、勇。子张问“崇德”，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将忠、信和义视为德的组成部分。樊迟问“崇德”，子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同上）孔子认为，“君德”指：“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闭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又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孔子又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所言之德指中庸、仁、知、勇、忠、信、谨、善世、不伐、诚和义。

最后就德和道、仁的关系而言，就孔子晚年而论，其所言之仁强调推己爱人，德注重天赋之性，道则突出天之精神。

就德、道关系而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大戴礼记·主言》）。道的存在足以说明人的德行系来自天之精神。德的存在令人遵道而行，使道得以日尊。“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是说德乃道之所行。孔子将中庸视为至德，中庸即依中而行，乃中之用及其功。中庸之为至德当指道之所行、所用及其功德即为至德。由上可知，孔子晚年所言之道乃指天之精神，德则指此种精神的体现，包括其行用和功德。

就德、仁的关系而论。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可见孔子将仁视为德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结构中，德的层次高于仁。行仁、用仁乃崇德、进德，崇德、进德应行仁、用仁。不过由于除仁以外，德还包括义、知、勇等，所以仁的行用仅构成崇德、进德的主要和首要途径，而非唯一途径。又从功用来看，按前所述，孔子认为，从爱人出发，推己及人为仁，博施而能济众则为圣而非仁。仁重实行而非结果，不能博施济众仍为仁。而德则重“进德”、“崇德”、“至德”。

在孔子晚年的思想体系中，道是天道，德是道的体现和功用，仁则是达成德的主要途径。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扼要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

参考文献

程树德，1990年：《论语集释》，中华书局。

古籍：《论语》，《史记》，《左传》，《周易》，《大戴礼记》，《礼记》。

刘宝楠，1990年：《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杨树达，1986年：《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冯国超（《哲学研究》2003年第6期）